

暮年梁启超 忙中有遗憾

大师课

1925年秋,梁启超52岁。9月8日,他从天津“饮冰室”的意式小楼,搬到北京清华园,入住北院教员住宅2号,在这里开启了入清华为师、专注学术的新阶段。

梁启超的文章以感情奔放著称,他的课堂又是什么样呢?幸亏有学生梁实秋,以他的亲身经历,给我们再现了一位有趣又独特的梁启超。

课堂上,梁启超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:头一句是“启超没有什么学问”;眼睛向上一翻,轻轻点一下头,又说:“可是也有一点喽”。

至于演讲的魅力,“到紧张处,便成为表演,他真是手之舞足之蹈。有时掩面,有时顿足,有时狂笑,有时叹息。”

毕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,他讲得认真吃力,渴了就喝一口开水,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,不时地呼唤他坐在前排的儿子:“思成,黑板擦擦!”

出于“名人”效应,不少社会人士慕名前来听课,很多时候连过道也挤满了人。

梁启超是性情中人、富于热情,其人格魅力是学生们一致认可的。不过,关于口才倒是有不同的看法,关键就在于,能不能听懂他的“广东官话”。

家务事

1925年12月有噩耗传来,准亲家林长民遇难了。林长民是林徽因的父亲,也是梁启超的挚友。正在国外留学的林徽因,此时还没有与梁思成大婚,突然失去了经济来源,打算辍学回国。

梁启超在家信中劝慰林徽因道:“学费不成问题,只算是我多了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,你们更不必因此着急。”开始,林徽因不答应,想自己解决费用。可梁启超不同意,他嘱咐梁思成转告林徽因:“我从今以后,把她和女儿思庄一样看待。”

其实,梁启超早在1923年就把林徽因当女儿看了,他在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:“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,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,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,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。你想希哲(梁思顺的丈夫周希哲)如何,老夫眼力不错吧。徽因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。”

现存梁启超给儿女的信有400余封,在清华这几年写的尤其多。家里的事,他事无巨细地跟他们说,也把自己在政局中的困惑,向孩子们讨教,有时还会撒娇卖萌求安慰。

信件之外,他对孩子的事更是百般费心,梁思永考古实习,梁思成、林徽因海外结婚、回国谋职,梁思忠想参军,梁思顺的丈夫、外交官周希哲调迁,梁启超都为他们四处奔波,活络走动。

错割肾

在清华的第一个学期结束后,梁启超决定利用寒假去治病。从1924年冬,妻子被医生“判死刑”开始,他莫名其妙地患了一种病,总是尿中带血,时轻时重。起初,他瞒着家人,后来他不仅在清华讲学,且在京城各大高校都有定期演讲,顾不上看病。直到病情加重,他担心自己像夫人一样得了癌症,才决定去医院查一查。

他先去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,没查出所以然,又转到协和医院。协和医生借助X光,发现他的右肾有个樱桃大的黑点。经多位专家诊断,一致认为那黑点是肿瘤,且是尿血症的病因。1926年3月梁启超在协和医院接受肾脏切除手术,发现割下来的右肾并无毛病,且尿血的病症依旧。

此事放在任何人身上都难以接受,何况是梁启超这样一位名人。5月29日,其弟梁启勋在《晨报》发表《病院笔记》,对误诊的失望溢于言表。随后,陈西滢、徐志摩等也接连撰文兴师问罪,不能“白丢腰子”引发了一场“中西医医”的是非之争。

面对舆论,梁启超不仅拒绝起诉,还带病撰文,平实地讲述了自己的就医过程,并在结尾说:“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,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……我盼望社会上,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,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,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。”

忙不休

“当这内部生理大变化时期中,左肾极吃力,极辛苦,极娇嫩,易出毛病,非十分小心保护不可。”医生唯一的戒令,就是让他节劳,最多只做从前一半工作。但梁启超却是个极不听话的病人。

从1926年3月16日做的肾脏切除手术,至1929年1月19日去世,梁启超在清华每周授课,在国内四处巡回讲演;作为京师图书馆、北京图书馆、松坡图书馆和司法储才馆的馆长经手各项繁杂事务;为康有为、王国维等师友办丧事……在这些事之外,他还要写专著、论文、应酬文章与演讲稿。

虽然事务繁杂,但他总做得津津有味,他曾说,“梁启超”这件东西,就是由“趣味”元素组成的。在他

眼中,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,只恨一天没有四十八小时。无奈的是,再有趣的灵魂也是肉体凡胎,这三年中,他屡次尿血、发烧、右膀发痛、心脏不适……

1928年6月中旬,因为批阅学生成绩,他一连赶了三天,尿路阻塞约50余小时。“真是逼着我做纯粹的老太爷生活了。”万般无奈之下,梁启超极不情愿地辞去所有工作。

下决心不以俗事萦心后,他提笔写《辛稼轩先生年谱》。拼命奋战下,到9月已编至辛弃疾52岁。

9月27日,痔疮复发,他人协和医治,每天喝两杯泄油,足足灌了十天,弄得胃口全无,人也瘦到不像样子。但在住院期间,他仍托人到处寻觅关于辛弃疾的材料,忽得《信州府志》等书,狂喜,携书出院,痔疾并未见好,就急着回天津,一面服泻药,一面继续写。不能正常坐下,他便侧身斜坐着,又连写了三天。

10月12日,梁启超将年谱写到了辛弃疾61岁。这年朱熹去世,辛弃疾前往吊唁,在不胜悲痛之中作文以寄托哀思。梁启超考证出,辛弃疾的悼词已失传,仅存四句为:“所不朽者,垂万世名,孰谓公死,凛凛犹生。”

写完这个“生”字,他不得已搁笔了,这个“生”字,竟成了他此生1400万字著述中的最后一个字。

此后他发烧卧床,直到11月27日,再入协和医院医治。协和医院以为是肺炎,化验后,确认梁启超为中国第一例支气管念珠菌病患者。此病非常罕见,全球首例是1915年才在美国确诊的。在1929年的中国,也许只有协和医院才能确诊此病,至于治病,则束手无策。

梁启超于1929年1月19日逝世,临终时,竟无一语遗嘱。

据《北京日报》孙文晖/文

梁漱溟奔波劳碌过除夕

民国名士中,梁漱溟的过年方式可谓特别,据说,他过年期间绝不看戏,甚至不许他的家人去看。这个长期在农村生活、体会过农民苦楚的鸿儒认为,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,实在是一种罪恶。他选择的除夕方式,通常是奔波劳碌。

1936年除夕,北平的戏楼热闹非凡时,梁漱溟正在赴广州作讲演的途中。路经上海,他造访了军事教育家蒋百里,“承留午饭,盘桓颇久,谈话甚多。”话题主要围绕着当下的紧迫时局。

梁漱溟的务实,于此后的数年的春节中,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。

国共合作后的1938年初,身为国民政府参议员的梁漱溟只身前往延安,与毛泽东就当前局势进行了两次长谈。回归途中,坐火车到开封时恰逢除夕之夜,他一个人住进河南的旅馆,过了一个寡淡的春节。

1939年2月初,梁漱溟在征得国共双方同意后,带了五六个朋友和学生,到豫、鲁、晋、皖、冀以及苏北等省市部分敌后游击区巡视,2月18日的农历除夕,他在日记中简短记道:“车过三原,晤赵戴文(山西省政府主席)于一花园中;晚抵洛川,途中落雪。”以后八个多月中,他走

了50多个县市,食宿过的村、镇将近200个,于10月返回成都。其结论是:“总括起来,有三句话:第一句是老百姓真苦;第二句是敌人之势已衰;第三句是党派问题尖锐严重。”随后,他奔走于重庆、成都之间,联系一些知名人士,先后发起并参与创建“中国统一建国同志会”“中国民主政团同盟”。

1940年初,梁漱溟觉得这两年与孩子相伴太少,遂于当年春节携二子来重庆北碚“休假”。名为休息,实则对北碚的各项事业作了一次全面考察。次年,梁漱溟将其在璧山县创办的勉仁中学迁来北碚金刚碑罗家湾。

忧国之心,人皆有之。除了名士梁漱溟,普通百姓亦复如是。一个流传甚广的趣事是,1941年除夕夜,奉行所谓“曲线救国”的汪精卫在南京颐和路汪公馆前张贴了一副春联——“立民族民权民生之宏愿,开为党为国为民之大业”,标榜自己为“三民主义”信徒。当晚,就有人在对联上略作修改:“立民族民权民生之宏愿,开伪党伪国伪民之大业。”意思顿时截然相反。据说,从此之后,汪精卫再也没有写春联的“雅兴”了。

据《中国周刊》周昂/文

